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2.02.009

文化抗战与中国文化地理变迁

王继平, 武永峰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 抗战时期文化机构的西迁, 既是中华民族保存和延续中国文化的一次壮举, 也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文化奴役的文化抗战的组成部分。抗战时期文化机构的西迁, 改变了中国文化地理的格局, 使得西南地区成为战时中国文化的中心, 并有力促进了西部地区的文化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延安为中心的西北抗日根据地, 大力弘扬和发展了红色文化, 改善了西北地区文化相对落后的状况, 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西部的文化地理格局。

关键词: 文化抗战; 文化机构; 文化地理; 红色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2)02-0063-08

引用格式: 王继平, 武永峰. 文化抗战与中国文化地理变迁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7(2): 63-70.

The War of Cultural Resistance and the Change of Chinese Cultural Geography

WANG JiPing, WU Yongfeng

(School of Marx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 westward movement of cultural institutions during the Anti Japanese War was not only a great feat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o preserve and continue Chinese culture, but also a great struggle against Japanese imperialist cultural aggression and cultural enslavement. The westward movement of cultural institutions during the Anti Japanese War changed the pattern of Chinese cultural geography, made Southwest China the center of Chinese culture during the war, and greatly promoted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The northwest Anti Japanese base area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th Yan' an as the center, vigorously carried forward and developed the Red Culture, improved the relatively backward situation of Northwest culture, and profoundly changed the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pattern of Western China.

Keywords: The war of cultural resistance; cultural institutions; cultural geography; Red Culture

文化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文化保卫战。尤其

是文化抗战中文化机构的西迁, 深刻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地理格局, 使近代以来形成的“东高西低”

收稿日期: 2021-11-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史研究(1931—1949)”(18ADJ006)

作者简介: 王继平(1957—), 男, 湖南双峰人, 湘潭大学二级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 武永峰(1994—), 男, 山西晋城人, 湘潭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

中国文化发展地理格局得以改变,西部地区文化获得发展机遇,形成了战时文化繁荣的局面。同时,它奠定的基础使得西部地区文化发展在战后得到延续,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地理格局。学术界以往的研究,大多从抗战文化的角度出发,视文化机构西迁为西部抗战文化繁荣的表现,没有将其本身即文化机构的西迁作为文化抗战一部分,作为文化领域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壮举;也鲜少涉及它对中国文化地理变迁的深刻影响。本文从文化抗战视角出发,考察作为文化抗战组成部分的战时中国文化机构西迁过程,以及其对中国文化地理格局,特别是对西南、西北地区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及其对文化抗战时期西部地区红色文化发展的深远意义。

一 抗战时期文化机构的西迁

历史上,中国文化一直是以中原为中心向中东部辐射,因而华北和江南成为中国文化的重镇。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西学东渐,通商口岸和东南沿海地区成为现代文化的集聚地。以高等学校为例,抗日战争前全国有高校(包括专科以上学校)108所,大多分布在东南沿海沿江地区。其中北平14所,上海25所,河北(天津最多)8所,广东7所,占去全国的一半,而整个西部地区仅有8所^{[1]46}。再以图书馆事业为例。民国初年有公共图书馆20余所,1936年已达2840所,初步构建了公立的国立图书馆、省立图书馆、县(市)立图书馆体系。国家级图书馆有国立北平图书馆和国立中央图书馆,以典藏图书和政府文献为特色,由教育部主管,经费由中英庚款管理基金支出。省立图书馆,大凡每省一所,江苏、湖南、广西、河南则有两所以上。北平、上海、南京、青岛、衡阳、广州等大、中城市,另设市立图书馆。据统计,抗战前,我国省市立图书馆有42所,其中包括东北地区的9所。县级图书馆分县立图书馆和县民众教育图书馆。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极不平衡,藏书多、影响大、有规模的图书馆,多分布于经济文化较发达的沿海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县级图书馆也是如此。比如,1936年,江苏省有县立图书馆20余所,民教馆之图书馆76家,而湖南省仅有安化及溆浦县立图书馆2所^{[2]134}。博物馆事业也同样如此,1936年,全国已有博物院77

所,古物保存所101所(其中私立4所),但同样大部分建立在北平、上海等大城市和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至于现代的媒体,如报刊、出版、广播、电影等文化设施,基本上也集中在大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以出版业为例,抗战爆发前,全国主要都市均有出版机构,但主要集中在北平、天津、上海、杭州、武汉、重庆等地。1936年,中国出版图书已达9438种,然而,中国出版机构布局并不平衡。民国以来,“我国出版家十之八九在上海”,上海逐渐成为中国出版的中心。1930年,上海书业同业公会有法人会员80家。1935年,上海有各类书店261家,其中有出版、发行资格的有142家^{[2]382}。如此,形成了战前中国出版业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正中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6家大出版机构并立的基本格局,它们占据了图书市场的主要份额,并在各地设立分局或办事处。六大出版机构中,除正中书局设在南京外,其他均为上海的民营出版企业。此外,报刊事业也集中在大城市。抗日战争前,全国报纸多集中于经济文化发达的东部地区及沿海一带大都市。据有关资料统计,1932年上海有日报41家,1936年已达57家^{[2]352}。《北平晨报》(北平)、《世界日报》(北平)、《申报》(上海)、《新闻报》(上海)、《时事新报》(上海)、《大公报》(天津)、《益世报》(天津)、《中央日报》(南京)、《东南日报》(杭州)、《中山日报》(广州)、《扫荡报》(武汉)、《武汉日报》都是全国一流大报。南京、上海自1927年后一直是国民政府的新闻中心。

可见,抗日战争以前,中国现代文化设施基本上集中在大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西部地区相对落后。也由于这种布局,抗战爆发后,这些文化设施遭到日本帝国主义沉重的打击后,损失巨大。为了保存中国文化,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的侵略和摧残,中国文化界开始了艰苦而英勇的文化抗战。作为文化抗战的重要举措,文化机构开始了艰难的内迁过程。高等学校、图书馆、文物博物馆、报业、出版业纷纷迁往西南、西北地区,这造成了中国文化版图的西移,即中国当时的文化重心转移到了西部地区。

以高等学校为例。抗日战争期间,由外地先后迁入四川省的高等院校共计48所,占战前国民党

统治区全部 108 所高等学校的 44%^{[1]52}。迁往四川的高校有山东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东吴大学法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朝阳学院、山东医学专科学校、中央政治学校、复旦大学、蒙藏学校、北平师范大学劳作专修科、江苏省立蚕丝专科学校、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武昌中华大学、齐鲁大学、江苏医政学院、南通学院医科、铭贤学校、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吴淞商船学校、国立音乐院、之江文理学院、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华侨工商学院、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东方语文专科学校、

牙医专科学校、药学专科学校、中央工业职业学校、戏剧学校。迁往云南的高校, 最著名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后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 迁往贵州的有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唐山工程学院、浙江大学、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迁往云南的高等院校有中山大学、杭州国立艺专、中法大学、华中大学、中正医学院等校。迁往西北(西安)的有北平大学、北师大、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 这些学校先后合组为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

科技界进行的西迁也同样规模巨大。以迁入重庆的科研院所为例, 其几乎集中了当时中国最顶级和最先进的科研院所及科技团体, 见表 1~2^[3]。

表 1 内迁重庆的科研院所

院所名称	迁入时间	院所名称	迁入时间
中央研究院	1938 年	中央工业试验所	1937 年
中央农业实验所	1938 年	中央矿冶研究所	1938 年
中央地质调查所	1938 年	中央林业实验所	1941 年
中央卫生实验院(前身为卫生署卫生实验处)	1941 年	中国特效药研究所(由中央政治学校医务所 附设特效药物研究室扩编而成)	1942 年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1939 年	中国地理研究所	1939 年
油料研究所	1938 年	陆军制药研究所	1938 年
应用化工研究所	1938 年	弹道研究所	1937 年
中央水利实验处	1937 年		

表 2 内迁重庆的科技团体

团体名称	迁入时间	团体名称	迁入时间
中国工程师学会	1937 年	中国水利工程学会	1937 年
中国护士学会	1937 年	中国化学学会	1937 年
中国度量衡学会	1937 年	中国测绘学会	1937 年
中国化学工程学会	1938 年	中国地理教育研究会	1937 年
中国农学会	1938 年	中国气象学会	1938 年
中国地理学会	1938 年	中国自然科学社	1938 年
中华图书馆协会	1938 年	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	1938 年
中国科学社	1939 年	中国卫生教育社	1939 年
中国矿冶工程协会	1940 年	中华药学会	1942 年

此外,《大公报》《中央日报》以及中共的《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群众》杂志等均西迁至重庆; 新知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著名出版机构则迁入成都等地。

伴随文化机构的内迁, 文化人也大量进入西部。据不完全统计, 整个抗战期间, 中国难民总数达 2 000 万至 3 000 万; 其中, “文化教育者占 55%, 党政及国营事业者占 21%, 商人占 10%, 工人占 6%, 农民仅占 2%”^[4]。当时, “高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九以上西迁, 中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五以上西迁, 低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三以上西迁”^[5]。

众多文化名人也先后进入西部, 如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田汉、阳翰生、欧阳予倩、艾青、叶圣陶、胡风、曹禺、杜国庠、胡绳、张恨水、臧克家、沙汀、艾芜、光未然、洪深、于伶、赵丹、金山、丰子恺、徐悲鸿、关山月、李可染、廖沫沙、吴晗、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等; 此外, 竺可桢、王淦昌、华罗庚、周培源等一大批杰出自然科学家, 也来到了西部。

文化机构和文化名人的西迁, 是文化抗战的重要成就。这一文化大迁徙表现了中国人民保存和捍卫中华民族文化的决心, 使中华文化得以在战

火中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二 西南地区文化地理格局的变迁

文化机构和文化名人内迁西部,造成了中国文化的重心西移,从而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地理格局,使其格局由过去的“东高西低”变成了“西部崛起”。这一现象不仅深刻改变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化的地理分布,也对战后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深刻改变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化的地理分布,使得西部地区出现了一批因文化迁徙而诞生的文化重镇,如重庆、昆明、桂林。

重庆是战时首都,随着国民政府迁移而来的文化机构和文化名人众多。以高等学校而论,先后迁到重庆的就有31所,将近占全国内迁77所高等学校的二分之一。加上重庆本地设立的高等学校,到抗战后期,重庆地区的高校达到38所,居全国之冠。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店、开明书店等出版机构也先后从上海迁到重庆恢复营业和出版工作。到1943年上半年,在重庆的全国性文艺团体约有35个。文化名人更是云集重庆,茅盾、张恨水、胡风、叶以群、田汉、艾青、臧克家、夏衍、洪深、金山、黄宗江、谢添、徐悲鸿、叶浅予、丁聪等等,先后到达重庆。文化机构、文化名人云集,加上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重庆迅速成为大后方文化抗战的中心,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社会教育、科学研究等各个领域掀起了文化抗战的热潮。仅以戏剧界为例,1938年10月10日,中国第一届戏剧节在重庆举行。戏剧节历时22天,有20个剧团、1500名专业和业余团体的戏剧工作者参加演出,公演剧目40个,观众达10万人次。还有25个街头演剧队,如怒吼剧社、国立剧校、华北宣传队等等,进行了为期3天的大规模街头剧演出,盛况空前^{[1]110}。据统计,自1941年10月至1945年10月,重庆雾季公演剧目有106个,其中大型剧98个、短剧和独幕剧8个;参加演出的剧团有中华剧艺社、中国万岁剧团、中央青年剧社、孩子剧团、育才学校戏剧组、中国艺术剧社等27个团队^{[1]113}。电影业也成为重庆文化重镇的抗战文艺代表。由上海迁渝的中央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影摄影场以及大批电影工作者汇集重庆,如著名导演和演员史东山、

郑君里、于伶、田汉、夏衍、白杨、阳翰笙、金山、吴茵、张瑞芬、秦怡、谢添、陈白尘等等,其推动了重庆抗战电影事业的迅速发展。这些电影工作者先后摄制了《保家乡》《好丈夫》《塞上风云》《胜利进行曲》《火的洗礼》《东亚之光》《青年中国》《长空万里》《日本间谍》《中华儿女》《抗战诗集》《民族万岁》《东战场》《光复台儿庄》等故事片、新闻片、纪录片和科教片,奠定了重庆在抗战电影制作中的领先地位。

桂林当时是仅次于重庆的第二个抗战文化城。桂系与蒋介石的矛盾以及桂系对抗战的坚定态度,使得中共得以在此团结和影响进步文化界人士,开展轰轰烈烈的文化抗战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至1944年的短短6年中,在桂林路过或在桂林逗留和居住过的文化人有1000多人,在桂林发表作品的人达2000人以上;其中,闻名全国的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学者和教授有近200人。此外,从1938年底开始,迁入桂林的文化机构也非常多,其中不少是在全国有影响的机构,如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地理研究所、中华职业教育社、江苏教育学院、无锡国学专修馆、汉民中学,以及《救亡日报》社、国际新闻社、《国民公论》社、中国旅行剧社、《新华日报》桂林办事处、中国记者协会、生活教育社等等。桂林的中共党组织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在桂林进行各种抗日救亡的文化活动,造就了此一时期新闻、出版、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教育、科技事业的空前繁荣,使得桂林成为战时西南地区著名的“文化城”。

昆明地处西南边陲,因文化机构的迁入也成为抗战时期著名的文化重镇。昆明文化抗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以西南联大师生为主体的校园抗战文化与昆明城的社会抗战文化各具特色而又相得益彰、互为犄角。西南联大是人文学者荟萃之地,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师范学院院长黄子坚,中文系教授朱自清、罗常培、闻一多、陈寅恪,外国语文学系叶公超、吴宓、陈铨,历史学系刘崇鋳、雷海宗、钱穆、傅斯年、郑天挺、蔡维藩、蒋廷黻,哲学心理学系汤用彤、金岳霖、冯文潜,政治学系张奚若、钱端升、王赣愚,法律系燕树棠,经济学系陈岱孙,社会学系陈达、潘光旦、李景汉等等,都是当时中国的学界名流、

文化精英。他们的爱国情操和文化素养, 带动了联大校园抗战文化活动的开展。除了时事讲演、壁报宣传之外, 联大师生最有特色的抗战文化活动是群声歌咏队抗战歌咏活动。他们致力于普及救亡歌曲, 他们的歌声不仅飘扬在校园里, 而且经常随群社组织的兵役宣传队在龙潭街、大板桥等处回荡。当时流行的抗日爱国歌曲《毕业歌》《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松花江上》《游击队歌》《祖国的孩子们》《旗正飘飘》《丈夫去当兵》《五月的鲜花》《中国不会亡》等, 跟随着群社社员及联大学生的脚步, 传遍昆明的大街小巷。昆明广播电台正式成立之日, 联大歌咏团受邀参加广播音乐会。合唱团演唱了《黄河大合唱》中的《黄水谣》《河边对口曲》《黄河颂》《保卫黄河》, 贺绿汀的《游击队歌》, 黄自的《抗敌歌》《旗正飘飘》, 杜涛声、冼星海的《太行山上》, 田汉、贺绿汀的《胜利进行曲》。这些激励人们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的著名歌曲, 通过电波传遍昆明, 传向抗战大后方西南。著名的《黄河大合唱》就是经联大歌咏团首次介绍给云南广大听众的^{[1]233}。

其次, 抗战时期中国文化重心的西移也对战后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西迁的文化机构和文化名人在战后回迁或复员, 但其对西部文化发展影响是深远的, 其中最具深远影响的是教育。教育承载着传承文化的使命, 由于历史原因, 中国西部地区教育长期相对中东部地区落后。抗战时期教育机构的内迁, 为西北地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助力。

以基础教育为例, 长期以来, 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存在经费不足、学校少、师资力量缺乏、教学质量不高的问题。抗战时期, 一方面, 国民政府加强了对西部教育的投资, 设立了“国民教育中央补助”、地方国民教育特种基金, 并对西部地区倾斜; 同时, 国民政府先后在河南、陕西、甘肃、四川、贵州、广西、青海、宁夏、绥远、重庆等省市设立国立中学 23 所、国立华侨中学 3 所、国立中山中学 2 所、国立女子中学 2 所, 加上改办为国立中学的 4 所, 共 34 所国立中学。另一方面, 内迁的高等学校在师资力量方面与地方资源共享(教师到地方学校兼课或与地方合作办师范学校和师资培训班), 传输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 促进了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 使

西部地区学校数、学生数迅速增长, 如表 3 所示。

表 3 抗战前后四川省基础教育情况

年份	小学教育		中学教育	
	学校 / 所	学生 / 人	学校 / 所	学生 / 人
1935	17 177	1 022 254		
1936	20 322	1 360 309	230	
1937	24 474	1 891 979		
1938	25 975	2 001 194		
1939	25 481	2 045 192		
1940	31 330	2 169 060	521	
1945	52 711	3 814 743		

资料来源: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三编第二章“各省实施义务教育概况”、第三章“各省市实施国民教育概况”^[6]; 表格存在的数据缺失情况系原资料数据缺失所致。

表 3 中数字统计并不完整, 但可以看出其增长速度和规模的扩大。贵州、云南的情况也同样如此。贵州省 1937 年有小学 3 171 所、学生 264 588 人; 到 1940 年, 小学增加至 5 503 所、学生增至 441 250 人; 到 1945 年, 小学达 8 825 所, 学生达 772 217 人^[6]。抗日战争前, 贵州办有高中的中学只有 3 所, 而且都集中在贵阳; 到 1945 年, 贵州办有高中的学校增加到了 38 所, 全省每个中学区(专区)都办有高中。据统计, 当时贵州 87 个县、市, 有内迁院校和国立中学的就有 25 个县、市^[7]。抗日战争前夕, 云南的 114 个县和设治局, 仅有 66 所省立县立中学, 6 所省立中等师范, 9 所县立简易师范及乡村师范, 4 所工、农、商职业学校。不少县只有小学, 而没有中学。到 1946 年西南联大复员时止, 云南有 167 所公、私立中学, 14 所省立中级师范, 25 所县立师范(含简易师范、乡村师范), 11 所职业学校(工、农、医、商、女子职中)。其中有省立完全中学 21 所, 分布于 12 个中学区; 县立初中(有的后改为省立初中) 108 所, 设于 9 个县内; 另有 2 所市立中学, 36 所私立中学^{[8]590}。从师资力量来说, 以云南为例, 据云南省教育厅 1934 年的统计, 这年, 在云南 1 000 多名中学教师中, 属中等以下学校毕业的学业不合格教师占 35% 左右, 其中云南省立中等学校占 10%~15%, 县立中等学校占 40%~60%。抗战初期的 1938 年, 云南省 200 多名中学等学校教师中, 属国内外大学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的达不到半数, 而且, 大部分都没有受过高等师范教育。为此, 云南当局联合迁滇高校采取多种形式, 加速云南师资队伍的培养。如国立西南联大除应云南教育界的要求于

1938年增办师范学院外,还为云南培养中学教师,并对在职教师进行培训。1940年,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有363名本科生,其中云南籍学生就有116人,占32%;1941年,云南省为缩短师资培养的进程,在师范学院内设3年制专业科,设文史地、数理化学两个综合专业组,每年招收60余名学生,其中80%以上的学生是云南籍的。更重要的是,西南联大复员后,将昆明师范学院留下,使之成为云南教师的摇篮^{[8]590}。

三 西北地区红色文化的兴起

在中共抗日根据地陕北,虽然没有如西南一样的文化大迁徙,但是也有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和文化名人来到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也千方百计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抗战队伍,同时在抗日根据地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自然科学学院等一系列文化部门,并利用冬学的形式,开展广泛的识字运动。如此一来,不但提高了民众的民族意识,也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程度,使陕北以及其他处于偏僻地区的抗日根据地的文化状况得到改善;同时,其也促进了西北地区红色文化的兴起。

第一,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文化中心。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追求进步的爱国青年的圣地。这个西北贫瘠的小城,因为抗战的到来,更因为中共中央和革命力量的汇集,成为文化抗战的重镇,是抗战文化的繁盛之处。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在这里建立起陕甘宁边区,成立了革命民主政府。1936年11月下旬,在陕北保安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毛泽东亲临成立大会发表讲话,号召文艺工作者要向全国人民宣传团结抗日精神。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海内外成千上万进步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延安,为延安抗战文化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延安抗战文化得以迅速发展。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文艺界抗敌联合会、“边区音协”“边区美协”“边区剧协”等数十个抗战文化团体纷纷成立。《文艺突击》《大众文艺》《文艺战线》《文艺月刊》《谷雨》《草叶》《诗刊》《新诗歌》《部队文艺》《文艺》《解放日报》副刊等文艺刊物纷纷创办。抗战教育、新闻出版业逐步兴起,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抗战气息。

延安抗战文化的显著特点是其群众性。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指导下,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精神感召下,延安文化工作者到前线去、到农村去,深入到群众中;获得解放的群众也兴起了学文化、开展抗战文化活动的热潮。陕北高原的延安城,成为西北文化抗战的中心。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抗战运动,提高了西北抗日根据地民众的文化水平,为争取文化抗战胜利和促进西北地区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在坚决抗战的目标之下实行“国防教育”,即“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禁止汉奸的宣传”^[9]。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提出抗战期间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战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0]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各抗日根据地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恢复与重建学校教育,利用各种形式开展社会教育,并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开展职业教育;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工农战士。

学校教育方面,为使教育内容和方式适应战争化需要,边区和各根据地对学生的教学时间、教学内容、教学目标等进行调整,摒弃过去的教育方针中不适用于国防教育和抗战教育的内容,本着“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的原则^{[11]48},在新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的指导下,“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11]44},在有效的空间和时间内,充分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把边区和根据地的适龄儿童和青年学生培养成抗战的重要后备力量。

社会教育方面,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建立政权以后,积极发展边区的民众教育。1939年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12]7}社会教育的主

要形式是夜校、识字班和识字组以及冬学。“它是最灵活的方式吸收在各种工作万分忙碌当中的最大多数的革命群众。它在扫除文盲的过程中,应当是最精悍最有效的一支军队。在完全消灭文盲的过程中,它将是一个最有力量者。”^{[12]262}冬学是北方地区冬季开展社会教育的一种主要形式。中共中央到达陕甘宁地区之后,为了解当地的民众教育情况,徐特立对陕甘宁地区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北方地区冬季严寒,农民赋闲在家,若此时开展民众教育,可吸收大批农民加入到社会教育大军中。鉴于之前陕甘宁地区有在冬季办学的经验,避免群众文化水平过低导致难以发动的问题,1936年《红色中华》刊发了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份关于开展冬学运动的指示,旨在要求各级教育部门在组织日常识字运动的基础上开展冬学运动,充分利用北方地区冬季农闲时间,对农民进行识字教育、政治教育和自然科学教育。1937年边区政府正式成立之后,边区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冬学的通令》,通令指出:“全国性的抗战在蓬勃的发展,今日的边区已处在直接抗战的阶段了。今年的冬学是在直接抗战上的状态中举办,无疑地是与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密切联系的”,“冬学就是国防教育领域内总动员的具体任务,所以边区教育部特决定冬学是经常的学制之一”^{[12]1}。将冬学列为边区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举措,是解决边区文盲率极高问题的重要方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教育大大改善了边区和各根据地群众文化落后、自然科学知识匮乏的状况。扫盲教育在边区和各根据地的大力发展,使得边区群众具备了一定的识字基础,有助于他们学习党的抗战方针和自主自愿参加边区建设和抗战活动,这样,既促进了文化抗战,也推动了西部地区教育的发展。

第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文化运动,推动了抗日根据地新闻、出版、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也为西部地区的文化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闻报刊是教育和鼓舞人民进行抗战的有力武器。在陕甘宁边区,除新华社及党报《解放日报》外,还组建了广播委员会,建立了广播发射台,设立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报刊更是如雨后春笋般诞生,主要报纸有《边区群众报》《抗战报》《战

声报》《部队生活报》《关中报》《练兵报》《战报》等近30种;主要刊物有《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共产党人》《中国工人》《中国文化》《解放》周刊等60余种。

出版方面,1937年4月,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决定成立新华书店,负责陕甘宁边区新闻图书的出版、印刷、发行工作。1939年9月,随着新闻出版业的发展,新华书店成为中共中央发行部的下属机构,开始对外运营,把党报党刊书籍发行到各抗日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等地。1939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规定“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应用各种方法建立自己的印刷所(区党委与省委力求设立铅印机),以出版地方报纸,翻印中央党报及书籍小册子”。1941年冬,为了加强党对出版业的领导,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改建为中央出版局。1942年4月,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统一延安出版工作的通知》,“决定中央出版局统一指导、计划、组织全延安各系统一般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之责,中央宣传部负统一审查全延安出版发行书报之责(中央书记处及西北局常委会直接出版的书报除外)”^[13]。中共中央对出版工作的重视,推动了根据地的出版工作,抗日根据地的出版事业得以迅速发展。从1937年至1940年,延安地区的出版发行机构纷纷建立,各类报刊、图书出版呈现繁荣景象。陕甘宁边区的出版、发行机构,大致可分三种类型:一是编辑报刊与出版图书工作合二为一的报纸、杂志社,如解放日报社、八路军军政杂志社等;二是专营图书出版的机构,如解放社、新华书店等;三是兼做编辑出版工作的机关、团体、学校,如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抗日军政大学等^{[13]04}。

文学创作方面,出现了以延安为代表的抗日根据地文学。在延安的作家,有“土生土长”的北方乡土作家,有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进步作家,还有对中国抗战抱有同情的国际作家。本土作家的代表有孙犁。他创作了很多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白洋淀》。这篇小说,残酷而激情的画面比较少,但是作者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突出了普通劳动者对抗日战争的支持。在诗歌创作方面,最著名的是光未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群众性的诗歌运动在解放区也开展得轰轰烈烈,出

现了大量在当时影响较大的作品,如《东方红》《十绣金匾》《十二月唱革命》《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都是流传很广的民歌。

艺术方面,抗日根据地美术和戏剧活动成为宣传抗战的普遍形式。就美术而言,延安到处是宣传抗战的壁画、漫画,当时有人这样描述:“有人说延安城是标语和图画装成的,这是真话,一座不十分大的城里,无论大街小巷、墙壁上、门板上、土堆上,甚至一棵树上都贴满了。……在延安城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有一处找不到抗战宣传画和木刻的痕迹。”^[14]在抗战戏剧方面,秧歌剧在根据地特别是延安以及陕北的其他地方都非常兴盛。“从1943年农历春节至1944年上半年,一年多的时间就创作并演出了三百多个秧歌剧,观众达八百万人次。”^[15]新歌剧的代表作是《白毛女》,在其示范下,出现了《刘胡兰》《王秀鸾》《赤叶河》《不要杀他》等一大批新歌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抗战,不仅鼓舞了人民的抗日热情,也给文化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带来清新的文化气息,奠定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西部文化建设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文化具有鲜明的红色文化特色,其增添了近代中国人文地理的红色亮色,为当代红色文化的弘扬和传承奠定了基础^[16]。

总之,抗战时期文化机构的西迁造成的中国文化重心的西移,为西部地区文化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该地区的教育事业也因此受惠巨大。教育的发展,提高了人的素质,改变了人的观念,同时也直接推动了西部地区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文化事业的发展,也为其经济发展带来动力。应当说,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西部地区进行的第一次文化大开发运动,也是现代西部地

区文化大发展非常重要的时期。

参考文献:

- [1]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
- [2] 孟国祥.抗战大迁移丛书:烽火薪传:抗战时期文化机构大迁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3] 唐正芒.中国西部抗战文化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20.
- [4] 佚名.许委员长讲救济难民问题[N].新华日报[N].1938-05-22(2).
- [5] 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2卷[M].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261.
- [6]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三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 [7] 张羽琼,郭树高,安尊华.贵州:教育发展的轨迹[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271.
- [8] 蔡寿福.云南教育史[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 [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48.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82.
- [11] 人民教育出版社.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 [12] 陈元晖,璩鑫圭,邹光威.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抗日战争时期)[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
- [13]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367.
- [14] 黄宗贤.大忧患时代的抉择:抗战时期大后方美术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93.
- [15] 刘增杰.中国解放区文学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267.
- [16] 黄冰凤.习近平红色文化观的三维向度[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5(1):24.

责任编辑:黄声波